

## 荷兰的华人, 华人经济与就业

张康清

中国人飘洋过海由来已久,其分布也遍及世界各地。据研究,中国人的移民历史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时期”,从二三千年前到18世纪的明、清王朝,这一时期中国人主要前往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帝制的衰亡到民国阶段(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人迁往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并以“苦力贸易”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国人从大陆迁出受到严格的控制,仅有少量的合法迁移发生;第四阶段是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一段时间。根据Poston, D.L.和Yu, M.的估计,在本世纪80年代,全球的海外华人人数为2 680万~2 750万,其中90%居住在亚洲。在另外的10%当中,有152.1万居住在美洲,76万居住在欧洲,17.7万在大洋洲,7.7万在非洲①。

除了全球华人人数众多之外,另一个有趣且极其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餐馆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中国移民的经济发展高度集中在象餐馆业等几个部门。在荷兰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为此,笔者在荷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归纳成本文。

### 一 荷兰的华人——人口学一瞥

#### (一) 中国移民荷兰的历史沿革

就时间和规模而言,中国人迁移到荷兰,情况十分不同于迁移到美洲和东南亚一带。中国人何时开始迁往和定居在荷兰,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有人认为最初大量中国人前往荷兰是在1911年。那一年,荷兰的船运公司为抵制一次著名的荷兰海员大罢工而从英国等地雇佣廉价的中国船员②。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在荷兰定居、学习和工作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他们或从事于进出口贸易,或从事于一些如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等行业。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于东南亚,特别是来自于前荷兰殖民地。他们的祖先是为逃避太平天国战火在1851~1864年

从广东和福建等地来到东南亚一带的。稍迟一点,在19世纪90年代初,另一些中国人自山东省从大陆路经西伯利亚,跨越欧—亚大陆来到荷兰。他们主要是街头小商、小贩和街头艺人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荷兰到别处谋生去了。最早从浙江迁移到荷兰的中国人是在1918年从水路经意大利和法国来荷兰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上海和宁波等地,在1898~1940年当水手来到荷兰的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本世纪70年代,从中国大陆迁往荷兰的人数极少。相反,香港则是当时中国移民的主要来源。这种状况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开放政策而发生很大变化。从那时起,尤其在1976~1990年期间,从中国大陆迁入荷兰的人数明显增加,而从香港迁入人数的减少也相当明显④。

#### (二) 目前在荷兰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

荷兰中央统计局(CBS)将非本地人口的国籍根据四个标准来决定:(1)现有国籍;(2)出生地;(3)父亲的出生地;(4)母亲的出生地。在荷兰的中国人当中,有从前荷兰殖民地(如印尼和苏里南等)来的移民和后裔;有从越南来的政治难民;有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的并主要从事于中餐业的移民及后裔等。有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数据资料,确定各自的“中国人”范畴。本文根据其目的,特别是资料的可获性,所谓的“荷兰的中国人”指的是具有中国(包括香港)国籍,和不具有中国(香港)国籍但出生或父母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中国人。据CBS

①Poston, D.L. and Yu, M. 1990,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4, 3: 480~508.

②Pieke, F.N. 1992,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Revue Europe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10/1992).

③Chenpah, 1985,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msterdam.

④Zhao, Y. 1992,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January 1990" Mndstst Bevoek (CBS), 92/6: 17~123.

的统计,至1990年,在荷兰的中国人数为38 761人,其性别、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和就业分布将分述如下。

在荷兰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十分平衡。这一平衡的性比例隐含着两个特点:(1)迁往荷兰的中国人是与家庭相联系的,即既包括家庭成员中的男性,也包括女性。这一特征反映了荷兰的移民政策对迁移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合家前往的移民方式对他们的就业和经济事业的影响;(2)正因为这种合家前往的迁移,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移民的新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可能是不尽相同(这些会在下一部分作进一步论述)。

就年龄而言,在荷兰中国人的年龄结构相对于荷兰人口来说是较为年轻的。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28岁,而荷兰人是35岁。约30%的中国人的年龄在0~14岁,3%是在65岁及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约占67%左右<sup>①</sup>。这种年龄结构也会反映在他们的就业压力上。在地区分布上,尽管在荷兰的中国人已遍布全荷兰,但一般集中在荷兰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地。而且是与城市地区相联系的,这种分布状态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就业发展,特别是餐馆业的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荷兰中国人的就业状况。遗憾的是,由于资料原因,笔者未能获得可信的统计数据。但从上述数据可以作一估测。全荷兰有近2 000家中餐馆,中国人人数为38 671人,劳动人口是25 970人,若假设在每家餐馆有6~10人工作,那么,在2 000家中餐馆工作的人数为12 000~20 000左右。很显然,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在46.2~77.0%之间。由此可见,餐馆业对中国移民的就业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 荷兰的华人经济——餐馆业

### (一) 荷兰中餐业的发展概况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人迁往荷兰的先驱们并不从事餐饮业。荷兰中餐业的出现是在1930年代末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大城市<sup>②</sup>。在那时,中餐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的中国客人。中国人对中国菜的特殊需求和偏好不仅形成了中餐馆的最初市场,而且对后来中餐馆的稳定持续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当时,这种有限的客源市场本身却又反过来限制了中餐馆的潜在发展。比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阿姆斯特丹仅有五六家中餐馆<sup>③</sup>。

这种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本世纪50年代,自此是中餐馆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客源市场超越了华侨界,开始接待当地荷兰客人和其他客人。随着1949年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很多荷兰人从印尼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并带回了他们对东方食物的爱好。这意味着一个迅速增长的客源市场。不象有些国家(如法国),在荷兰没有土生土长的、廉价的、大众化的菜肴传统。将现存的中国烹饪和印尼烹饪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印菜便成为荷兰标准的外国菜肴<sup>④</sup>。从而在荷兰的“中—印”餐馆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现象,而不是象其他国家的中国餐馆。到60年代末,在荷兰的中国餐馆几乎都挂有“中—印餐馆”的招牌以适应荷兰特殊的市场情况。

70年代~80年代初期,是中—印餐馆发展的黄金阶段。它有三个显著的标志:(1)中—印餐馆的总数有了明显的增加。据统计,餐馆数从1960年的225家增加到1982年的1 916家。平均年增长率达17%,为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中—印餐馆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荷兰的西部地区,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大城市,而且散布于荷兰各地(首先是南部,随后是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小城镇甚至村庄。(3)中—印餐馆的市场占有率也从1960年的17%增加到1982年的32%。

中—印餐馆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荷兰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他们能够经常地光顾包括中—印餐馆在内的各种餐馆。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是中—印餐馆发展的困难时期。目前中—印餐馆的总数已达到了饱和点,并面临着新的市场形势的挑战。据估计,每家中—印餐馆所覆盖的人口平均为5 000到10 000人。由于众多的当地和外国旅游者产生的额外需求。在西部的三大城市(阿、鹿、海)则明显低一点,大约3 000人左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其他荷兰少数民族餐馆如:土耳其餐馆、意大利餐馆、摩洛哥餐馆等在餐饮业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结果

<sup>①</sup>Zhao, Y. 1992,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1 January 1990", *Mindst Bevolk (CBS)*, 92/6: 17~23.

<sup>②</sup>Wieringa, F. 1990, "Dongfeng-Oostenwind: Chinezen in Nederland; Amsterdam Historisch Museum, Amsterdam.

<sup>③</sup>同②。

是, 中一印餐馆的发展出现了滞涨, 它们的市场占有率也开始出现缓慢下降(见表1)。

表1 1960~1991年荷兰的中一印餐馆总数及其变化

年份	餐馆数	绝对变化数	年平均相对变化(%)
1960	225	—	—
1970	618	+393	+17
1982	1916	+1298	+17
1987	1842	-84	-1
1991	1988	+146	+2

资料来源: 出自PieKe, F.N.1992(见注①)。

#### (二) 中一印餐馆业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根据荷兰中一印餐馆的发展历程, 中一印餐馆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中一印餐馆的发展因地而异。从历史上来看, 荷兰西部人口密集地区, 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曾是中国餐馆的发祥地。逐渐地, 它们散布到荷兰各地的城镇和一部分乡村。中一印餐馆业的经营发展和中国菜的正宗程度与它们的地理分布有很大联系。根据笔者在荷兰的实地调查发现, 位于市中心或商业街特别是在所谓“唐人街”①的中一印餐馆一般生意较为兴旺, 且烹饪也比较正宗。而在其他居民区, 中一印餐馆的生意则一般不如商业区的餐馆, 其菜肴和烹饪也多多少少有所改变。据当地华侨的介绍,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商业区的就餐顾客比居住区的多; 二是由于中国人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商业区附近, 在商业区就餐的顾客中, 中国人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此, 中一印餐馆只有保证其中国菜之本色, 才能符合顾客的需要。在其他居住区则以荷兰人等为主要服务对象, 这些餐馆的烹饪不得不在中国菜的基础上, 根据荷兰人的口味加以调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这部分餐馆的菜已失去原来的品貌, 但荷兰人则认为这些就是他们欣赏、喜欢的中国菜。不管怎么样, 从中一印餐馆(或其老板)的角度来看, 不管菜肴是不是正宗的中国货, 只要符合顾客的口味、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就行。

第二个特点是: 中一印餐馆主要和家庭相联系。尽管在荷兰也有为数不多的太规模现代商业型的中一印餐馆如“海上皇宫”、“海洋乐园”等,

但绝大多数是家庭式的小型餐馆。与现代大型商业企业不同, 家庭式的小型餐馆(或企业)被认为仅是一种自我就业的方式, 其商业目的并不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 而是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和维护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笔者在荷兰的调查也发现, 这种家庭式餐馆对他们的劳动力使用、管理、劳工的工作条件和商业发展有显著地影响; 而且, 这种类型的餐馆与移民方式如“链式迁移”, 也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特点, 就是中一印餐馆是自我依赖的。一方面, 他们依赖自己的文化资源, 也正如当地的部分华侨对我介绍的: “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延续了完美的中国烹饪, 我们华侨也就能够利用祖辈的传统来开办我们的餐馆。”就移民而言, 华侨在资本、市场信息等企业性资源方面是相对不足的, 他们要想在迁入国的经济领域中立足, 可依赖的资源之一就是自己的文化资源。而中国的烹饪又是举世公认、广受欢迎的。难怪华侨会普遍选择餐馆业作为立足之本。另一方面, 由于在荷兰的华侨不算是荷兰的少数民族, 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既没有其作为法定少数民族的移民们所享有的帮助, 又没有作为当地荷兰人士的便利。华侨只能依赖自己的资源来解决就业问题。笔者在荷兰的抽样调查显示, 在很多地区, 荷兰就业部门并不把“中国人”单独列为一项登记失业情况。在有些地区, 直到1992年1月1日开始才将“中国人”列为一项进行登记。连最基础的登记材料都没有, 那华侨失业者所需政府就业部门的具有针对中国人特点的(如语言障碍等)就业帮助就可想而知了。侨居荷兰的华人, 从个体来看, 对在荷兰的公司等就业部门寻找工作屡遭失败以后, 不会公开的抱怨, 而一般只是默默地自我寻找, 最终又只能回到以餐馆业为主的华人经济圈子之中。从华人整体来看, 依赖自身资源成了在荷兰立足的最基本战略。

基于中国餐馆业的发展概况和特点, 中国餐馆

①不管从规模或典型性来看, 荷兰的“唐人街”完全不同于美国、英国或法国等地的“唐人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唐人街”曾逐渐形成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战后, 由于战争和商业的原因它们逐渐消失或搬迁到其他街区而丧失了“唐人街”的集中性。今天在荷兰, 人们只能在一些大城市市中心几条大街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开的餐馆、商店等等。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典型的“唐人街”。

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餐馆对中国移民的就业方面起的作用不尽相同。50年代以前，由于有限的市场和餐馆数，中国餐馆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1950年以后，特别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餐馆逐渐地起了主导作用。据估计，40~70%的中国劳动力在餐饮业就业。另有15~20%是登记为失业并正在寻找在餐饮业的工作，如作为招待、厨师或餐馆经理等①。

第二，中国餐馆为华侨在当地就业、谋生、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提供了选择。有些学者认为，中一印餐馆业给荷兰的中国人提供了崭新的机会。而笔者认为，准确地说，中国移民是迫于市场机会，最终集中于餐馆业。在荷兰中国移民的最初就业方式并不是开餐馆，而是作为海员或是卖花生糖的小贩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管中国移民曾从事于哪一种就业方式，其作用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绝大多数中国移民就业于中国餐馆与其他各种就业方式并无大的区别。这种在就业方式本质上的相似性再一次显示了移民是迫于新的社会环境来寻求就业机会的。

第三，尽管餐馆业在中国移民的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决不意味着这是中国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部门。另一部分中国移民则从事于其他部门，如杂货店、录像影视商店、书店、进出口贸易公司等等。但是，在这部分中国移民明显占少数。

### 三 中一印餐馆的劳动力使用

如前所述，移民依赖自身资源是在迁入国立足的基本战略。自身资源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本身的廉价劳动力。在中一印餐馆里一般也存在这种状况。但是在大型和小型餐馆之间、在老一代和新一代移民之间、在男性与女性劳动力之间，中一印餐馆的劳动力使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一) 劳动力使用在大型和小型餐馆之间的差异

根据荷兰旅店饮食业协商会以营业额来衡量餐馆规模的标准，可将餐馆划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类。大型餐馆指的是营业额在610 000荷盾及以上的餐馆，小型餐馆则是那些年营业额在195 000~610 000荷盾之间的餐馆。当然，若将餐馆划分为“家庭式”和“商业型”两类，对于本文的分析更为有利。但可惜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使这种分类量化，故只得沿用如上的划分类型。

在大型和小型中一印餐馆之间，劳动力的使用

具有明显的差异。其规模越大，使用的雇佣劳动力也越多，小型餐馆更倾向与使用家庭成员。小型餐馆的老板和其家庭成员在其使用的劳动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约为总劳动力的65%。在小型中一印餐馆中，35%的劳动力是雇工，大型餐馆则有72%的雇工。另一方面，小型餐馆比大餐馆更多地使用临时的或者钟点工人（详见表2）。所有这些都给中一印餐馆，特别是小型餐馆在减少工资成本方面提供了相对优势。

表2 1990年荷兰中一印餐馆劳动力构成(%)

类 型	小型餐馆	大型餐馆
全时工	53	60
临时/钟点工	47	40
合 计	100	100
雇 主	40	16
家庭成员	25	12
雇 工	35	72
合 计	100	100

资料来源：Bedrijfschap Horeca, 1992. Chinese-Indische Restaurants, The Netherlands.

根据上述事实，小型餐馆比大型餐馆承担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小型餐馆总的劳动力成本平均只有大型餐馆的一半，分别在总成本支出中占7~11%和16~23%。从这些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小型餐馆具有劳动力使用的相对优势，它应该比大型餐馆的经济运作更为出色。

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Horeca的统计，大型中一印餐馆的人均年营业额要比小型餐馆的高约31%，分别为109 000荷盾和83 000荷盾。为什么小型餐馆在具有劳动力使用相对优势的条件下，而其经济表现却不如大型餐馆呢？可能的解释是：(1)大、小型餐馆不同的作用和本质决定了它们各自的

①Pieke, F.N. 1988,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Dutch Chinese: An Outline" China Information, Vlo.3t, 2: 12~23.

Pieke, F.N. 1992,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0/1992).

②Wieringa, F. 1990, "Dongfeng Oostenwind: Chinezen in Nederland", Amsterdam Historisch Museum, Amsterdam.

商业表现。如前所述,小型餐馆更可能是家庭式的,而这种家庭式企业(餐馆)则通常被认为是就业的手段,其商业目的是为了提供谋生条件和保持并逐渐提高生活水准。而大型餐馆则多少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其目的已不是简单的就业手段,而是追逐利润的极大化。(2)不同的管理方式同样也能导致商业表现的差别。在小型餐馆,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的科学管理,经理们、老板们终日直接从事于餐馆的日常操作之中,如掌厨或作招待等。他们几乎没有必要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工作,没有市场信息、计划等方面的工作。这种情况有时直接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如经营不当、违反当地的法律风俗习惯或宗教而遭巨额罚款等。与此相反,大型餐馆则多少有必要的办公工作、作市场分析和计划等等。这样,在它们之间出现的商业表现的差异是不足为奇的。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餐馆,劳动力使用都是以利用廉价而刻苦工作的劳动力为特征的。从管理的角度,利用廉价劳动力是降低餐馆成本、提供相对低价的食品、保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基本。从劳动力(指中国移民)的角度来看,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当廉价劳动力最终被“免费劳动力”(家庭成员)所替代,这个过程则达到极限。因此,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是中国餐馆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之一。但不幸的是,事实上,中国餐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工不足。

根据当地的华侨报纸介绍,造成这种劳工不足的原因主要是:(1)在荷兰有说广东话和说浙江温州话两大系餐馆。广东(包括香港)餐馆一般只雇佣会说广东话的工人,而浙江温州方面也雇佣会说他们方言的人。这样往往会形成有些餐馆找不到工人,而有些工人找不到餐馆工作的情况;(2)一般中国移民和餐馆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新来者。这样在小镇上开办的中国餐馆就很难找到补充的劳动力;(3)随着1997年的临近,一些在香港有亲戚的餐馆老板们借口劳动力不足,以便借口向荷兰政府申请更多的移民额度把他们的亲戚从香港(或其他地区)迁到荷兰来;(4)有些具有多年餐馆工作经验的工人则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情愿失业,直到找到新的满意的工作①。

为此,我曾访问过一家大型餐馆的老板,请他就此观点谈一些看法。他认为:“如果老板和工人之间连说话都听不懂,那这种工人怎么用啊?”。

对于香港的亲戚、朋友希望来荷兰之说,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只是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的亲戚和朋友。我相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上述的一些观点是有趣且耐人寻味的。如果劳动力短缺确是事实的话,我认为:(1)这种短缺是结构性的,无论是从语言方面或是从城镇居住差别方面。(2)上述的争论反映了劳、资方不同的观点。前者在文章里自称是代表工人的观点,而后者无疑是资方的看法。如果分析研究只依赖一方面的观点都会误入歧途。(3)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平衡对未来的迁移具有巨大的影响。只要廉价劳动力是中国餐馆发展的最基本前提条件之一,那中国餐馆的发展将取决于,至少是部分取决于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不能满足餐馆的需要,餐馆的对策之一就是寻求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它们试图吸引新的移民来荷兰也就不足为怪了。

## (二)新一代与老一代华侨的差异

如果说,老一代华侨选择餐馆业是迫不得已和扬长避短,那么,迅速成长的新一代华侨在就业方面与他们的前辈有何不同呢?

有些学者认为,已在荷兰受过相当教育的第二代华侨很不情愿重新回到他们父辈曾或正经营的餐馆业就业(参见pieke, 1992: 22)。但是我认为,年轻一代华侨所接受的荷兰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对他们就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荷兰的教育为在劳动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诸如语言能力、技术能力和其他一些与前同学、朋友等的社会交往等等,这是有利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等级性存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有可能拒绝那些在第二劳动力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等级底部的工作,这无疑会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和机会。更进一步,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移民可能作出的选择之一就是选择自我就业,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继承他们父辈的餐馆业。

笔者在荷兰的调查发现,新、老一代华侨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老一代华侨的社交媒介主要是局限在华侨界,其社交目的和方式也都

① 见鹿特丹《半月报》,1992年,第154期。

② Pieke, F. N. 1992, "Immigration and Interpreneurship: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Revue Europe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0/1992)。

是为了餐馆生意的需要。与之相反,新一代华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并已涉入到荷兰人社会。他们从小的同学是荷兰人,他们与外界社会的媒介是各种当地的社交场合和方式,如派对、迪士高、旅游等。在一定程度上,新一代华侨已(或正在)融入荷兰社会。这为他们进入餐馆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从老一代华侨来看,他们期望他们的孩子通过接受荷兰的教育以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时间、金钱、辛苦工作等等。

而从年轻一代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职业选择是理性化的。接受学校教育固然是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在他们选择的时候,其他因素如实际收入、机会成本、工作的满意程度和舒适程度等等也是他们所要考虑的。

因此,瞻望未来,新一代华侨也许会,也许不会继续在他们父辈所经营的餐馆中就业。

### (三) 女性劳动力的作用

在荷兰中国餐馆的男、女性劳动分工有别于传统的男、女性社会分工或家庭分工,是上述两种分工的混合物。因为在荷兰的中国移民是与家庭相联系,中国餐馆又是以家庭式为主,这种非典型的男女分工则反映了这个特点。一个家庭式中国餐馆的男女分工一般是男性(通常是老板)在厨房掌厨,女性(通常是老板娘)在前台作招待或收银员。这种分工对妇女的就业和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这种男、女分工反映了女性在餐馆中所拥有的技术明显不如男性重要。根据中国餐馆的技术等级,一般以洗碗在最低层,厨师在最上层,而招待等居中间。男性的技术等级往往比女性高,几

乎所有的厨师都是男性,而女性则主要是洗碗工和招待等等。

其次,女性在此技术等级中的提升不如男性快和明显。正如前面所说,在餐馆里,洗碗是技术等级中上升的起点,以厨师为最高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实的男女性技术分布则意味着男性有可能从技术等级的底部上升到最上层,而女性则一般停留在一定程度上而从不达到顶部。

最后,所有这些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男女性的权力关系,即对资源的控制和支配关系。能烧中国菜是中国移民的重要资源之一。上述技术等级的分布也暗示着女性对技术资源控制的缺乏。进一步来看,女性同样缺乏对资源控制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餐馆的收入分配是与技术等级相吻合的。这样,女性的收入往往较男性低,且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积累至男性化较短时间就能达到的资本以开办一家她自己的餐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国餐馆中男性占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状况。

###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荷兰的中国人在其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主要集中在餐馆业。而这种集中性在理论上则隐含着其必然性,并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相联系。从而在现实中又表现出各种特点和作用,以及劳动力使用在大型和小型餐馆之间、在老一代和新一代移民之间、在男性与女性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究其集中性的真正原因,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是文化上,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本文责任编辑:郭汉英)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